

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著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著

老北大讲义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重访老北大·敬聆大师言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史学方法导论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著

傅斯年◎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1
(老北大讲义)

ISBN 978-7-5387-2571-1

I. 史... II. 傅...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825 号

史学方法导论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作 者	傅斯年 著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陈 琛
特约编辑	秦千里 苗欣宇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726 发行科: 0431-86012939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9.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

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像，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

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 者

2009年3月

关于本书与作者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与北大渊源甚深，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1919年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赴海外留学，一度学习自然科学。1926年回国，后受蔡元培之聘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该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后，他便重回母校，兼任了北大教授。此后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在抗战胜利后，又一度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傅斯年在北大做过学生、学生领袖、教授和校长，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他对北大的功劳也确实巨大，在他第一次任教北大时，校长是蒋梦麟，他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他第二次任职北大，实是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校长，但胡在美国，傅斯年暂为代理。当时，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汉魏史专题研究等五六门课。

其中，“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课程内容，便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门课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该书于1929年开始写作，先期发表了《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等。但这本书并未完成，1934年他说“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可此后“因时局影响”，“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

而傅斯年曾对此书书名有过几次定名，根据他所撰其他文章分析，他倾向于使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名，所以，他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残稿整理后，以此书名出版。

何兹全先生评价说，此书“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邓广铭说：“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有其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傅斯年所系统论述的先秦东西两大族群的对峙和发展“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钥匙”。

此外，傅斯年的史学成就非但在考证，更在于方法。

比如这门“史学方法导论”课程包括三个方面：一，中国及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讲；二，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三，史料之整理方法。

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一思想得益于他在国外留学时受到了一代史学大师兰克（德国人，1795~1886）的影响。兰克强调重视史料，认为把史料分类摆出来就是历史，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傅斯年进而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种方法是否有瑕疵暂不必说，但它当年确实影响巨大，人称傅斯年开创了“史科学派”。他的学生邓广铭回忆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

史料论略^①

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出下列的几个结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它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不尽只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

^① 本章及所包括的“拟目”、“史料论略”为旧版整理稿，现依原版编排。

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徒然高揭“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一个口号，仍不过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实例，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

目 录

史学方法导论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1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2

第二节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20

第三节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22

第四节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23

第五节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23

第六节 本事对旁涉/24

第七节 直说与隐喻/25

第八节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31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33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41

史记研究/65

战国子家叙论/77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115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129

考古学的新方法/135

明成祖生母记疑/143

夷夏东西说/155

说《广陵之曲江》/197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205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217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一、夷夏东西说/223

1. 亳—商—殷/223
2. 夏迹/237
3. 夏夷交胜/242
4. 诸夷姓/247
5. 总结上文/257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

二、姜原/262

1. 姜之世系/262
2. 姜之地望/263
3. 姜姓在西周的事迹/266
4. 姜羌为一字/266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三、周东封与殷遗民/268

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1934年

四、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274

1. [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274
2. 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279
3. 周公之事功/279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五、论所谓五等爵/282

- 1.〔五等称谓的淆乱〕/282
- 2.〔公侯伯子男释字〕/292
- 3.〔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297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

附录/300

- 一、战国子家叙论/300
- 二、性命古训辨证/334

历史地理学知识问答（第二版）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